

改变
一切



一份安那其主义呼吁

假若你能够改变一切，你会想改变些什么呢？你会让你的下半辈子在享乐中度过吗？你会阻止全球变暖吗？你会许愿银行做慈善或者“廉政”的出现吗？让一切事物照旧运作，却希望它们能带来新的结果，这当然是一点也不现实的事。

我们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这正反映出全球局势的动荡与灾难。也许我们能够倾尽余生，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那些小问题。但这些问题全都有着共同的源头，小修小补的解决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因此，我们需要从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出发，重新思考一切事物的意义。



**始于方方面面，
终于改变一切。**

始于
自决

一个自由的幽灵仍在世界上游荡，正是它在任意地塑造这个世界。我们曾经被许诺过会有一个完全自决的国家——在那里，我们社会的一切机构都将用来保障我们自决的实现。

试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有完全自决的权利，你此时此刻都能做什么？想想你的人生将会有何其广阔的潜在可能——你将有何种人际关系？你将经历何种事物？你又将用何种方式来为自己的存在赋予意义？从你降生那一刻起，似乎你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你代表着纯粹的可能性。

通常来说，我们不会停下来想象这些。只有在那些人生中最为美丽的时刻——比如说当我们坠入爱河，取得突破或是到达远方时，我们才目眩神迷地从中瞥见我们人生所有可能性的冰山一角。

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你使自身潜质的全面发展呢？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掌控你周围的环境呢？你的一天又是如何度过呢？官僚机构，根据你服从指挥的程度来对你做出评价；经济制度，根据你能创造的利润多少来决定给你赋权大小；以及征兵办的教官们，他们坚持认为，达成“你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乖乖服从他们的权威！——以上所有东西，有让你的人生如你所愿地度过吗？

其实，我们都有着完全的自决权——这并不是因为谁赋予了我们这种权利，而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有，即使最极权的独裁者也无法将其夺走。然而，一旦当我们开始为了自己而采取行动时，站在我们对立面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正是那些名义上保障我们自由的“有关机构”！

始于

对自己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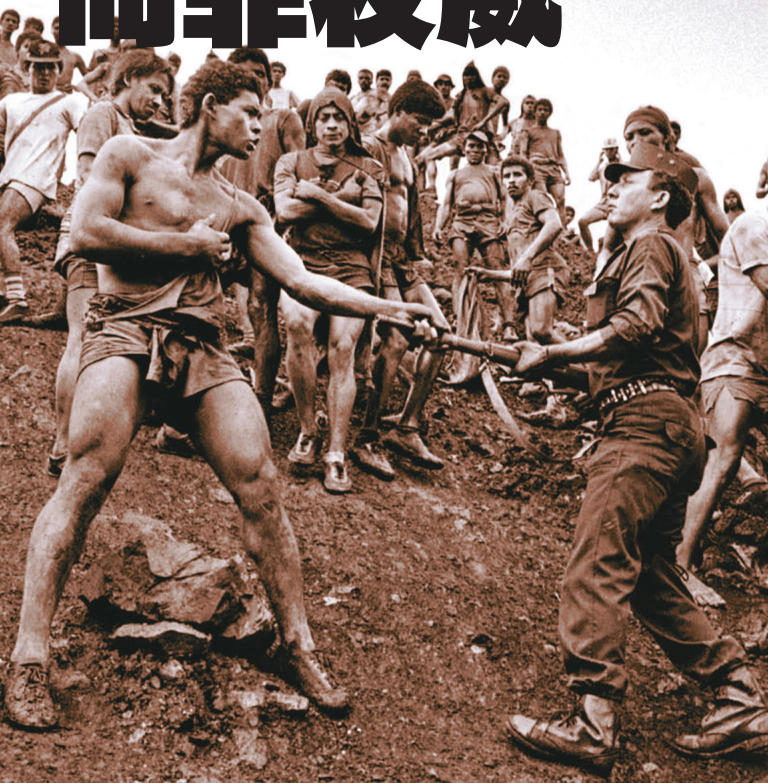
高管和税务员们总爱谈论个人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地为自身一切行为负责，根本上还需要遵从他们的指示吗？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伤害不是由恶意造成的，反而是顺从的后果。全世界各地的军火库都是人们甘愿顺从于他人的物质体现。如果你想证明自己从未对压迫、战争与种族屠杀做出过任何贡献，那么你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做顺从的羔羊。

对你的价值观而言亦然。数不尽的统治者与法条都要你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你只是不想为自己负责，而选择将责任拱手让给某些神明或教条来裁决，你又会选择由谁来做这个主？不管你爱不爱听，选择由谁为自己戴上镣铐的，是你自己。通常，人们很草率地就作出了这种选择，其结果也往往取决于哪个选项最为熟悉，或者最为方便。

我们对自己的信念与选择，负有逃不脱的责任。我们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交由那些大领导与清规戒律来决断。也许我们仍会彼此纷争，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按我们自己的做法来行事，而非不必要地制造一大堆悲剧，到头来却又只是服务于他人计划中的一环。

始于
**寻求权利，
而非权威**



劳动着的工人们拥有权利，而监督他们的老板们则拥有权威；保养房屋的住户们拥有权利，而在房产证上署着名的包租公们则拥有权威；河流拥有权利，而修水坝所需的许可证则拥有权威。

权利本身没有压迫性。许多权利可以是解放的——照护你所爱之物的权利、保卫你自己的权利、解决争端的权利、针灸的权利、操纵帆船的权力与荡秋千的权利。有许多方法能在发展你自身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他人的自由。当人们为了实现自身潜能的全面发展而行动时，他们都是在为所有人而行动。

而权威不同，一方面，它高悬于众人头顶，另一方面，又正是它夺取了人们的权利。好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权威永远是自上而下的：

士兵服从于军官，军官则要对主席负责，主席的权威则源自宪法——

神父对主教负责，主教对教皇负责，教皇对经文负责，经文的权威则源自上帝——

雇员对企业主负责，企业主对顾客负责，顾客的权威则源自金钱——

警察执行公安局签署的逮捕令，其权威源自法律——

男子气概、背景、财产……所有这些标准恰似一个个金字塔。而在其最顶端，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暴君，那里有的仅仅是社会建构——正是这些建构在催眠人类。

在这个社会，权利和权威是如此密切地互相联系，以至于我们很少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只有当我们顺从时，才被赏给权利。然而，若没有自由，权利就一文不值。

始于 信任关系



与权威关系不同，信任关系会把权利平等地分配，而非让它集中在权贵手中。一个人不应靠权威来获得信任。如果某人不值得信任，那他当然不配拥有权威！然而，除了政客和 CEO 们，还有谁更让人难以信任呢？

当消除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权利不平等后，互相之间的信任便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争端、达成共识，并产生互助的满足感。等级制抹杀了我们的信任，并让那些手握权柄者能够残忍地镇压冲突。

最理想的友谊是平等的，在尊重彼此自发性的情况下互相支持、互相挑战，从而更加刚勇、更加进步。我们现在就可以以此为标准，重新评估我们的人际关系了。当那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锁链——公民身份与法律、财产与债务、企业与指挥系统——终于消失时，我们便能在互助与自由联合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关系。

始于 调和个体与整体



“他人权利的开始，即是你权利的终止。”如果按这句话的逻辑推导，那么世上的人越多，自由便会越少。

但是自由并不是个人权利的泡沫，要把每个人与他人界限分明地割裂开来，实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打哈欠和大笑会传染，而对于激情与绝望之类的情感而言，同样如此。我们，作为人来说，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无非这些东西罢了：我们启齿说出的那些老生常谈、我们脑中浮现的那些歌谣，以及那些与同伴共情而产生的感情。当我开汽车时，污染物被排到你下一秒就要呼吸的空气里；而当你施放农药时，它们又渗进了人人同饮的水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现实中。但当有别的什么人挑战它、试图改变它的时候，你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重新规划现实生活的机会——你我的自由并驾齐驱，而若我的自由结束，你也不再拥有自由了。

我们不是分立的个体。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是个同时生活着数千种不同物种的共生体——它不是大门紧闭的要塞，恰恰相反，它进行着各种生理活动，好让营养物质与微生物时时刻刻来回穿梭。而我们同样置身于万千生灵共存的生态系统里，我们呼出的废气，转瞬即被田间的玉米吸入以作光合作用之原料，狼群与蛙类的喃喃夜语就像个体，就像小单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一样。按理说，谁都不可能仅靠自身就能够在真空中活动——宇宙引力的汹涌浪潮会淹没我们。

只有当语言被人们共同使用时，它才能为交

流服务。对于思想和欲求也是同理——我们能与他人交流这些事物，是因为它们高于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这些力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当我们选择培养某一种力量时，我们也将在与他人相处时用这种力量来影响他人。



自由既不是一种财富也不是一项财产，它是一种关系。与世隔绝的自由倒也并不妨事，但只有当所有人调和在一起时，更多的可能性才成为可能。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得为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毕竟，冲突与共识都能使我们得到充实与扩展，变得更为高尚。只要没有一个能强迫人们达成协议，或将大家共赢的冲突转变为赢者通吃式博弈的集权中央，就行。比起将世界打碎为一块块小小的领地，还是让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彼此紧密联系吧！



始于 解放欲望



生在这社会里，甚至连那些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热切的渴望，都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些渴求纯粹是被广告与其他形式的商业宣传浇灌培养出来的，旨在让我们一刻不停地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买买买。好好感谢我们的教育灌输吧！多亏了它，人们才会在做那些长此以往注定要陷于悲惨境地事情时，居然还会感到十分的快意！就这样，我们被囚禁于苦难之中，而将人们封印的正是那些虚幻的喜悦。

为了取得真正的自由，我们不能对那些源源不断制造欲望的体系坐视不管。因为，解放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满足我们今日的欲望，它还应该扩展我们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感知。这样一来，我们的欲望便能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呈现出更多样的可能，它们将驱使我们去创造。这就意味着摒弃那些被执行、被操纵与被私人占有的低级愉悦，而去探寻那种真正的幸福，使我们从机械的服从与竞争中挣脱出来的幸福。举个例子，若你曾有过戒除烟瘾或是酒瘾的经历，那你就已经多多少少明白了，转变你的欲望，究竟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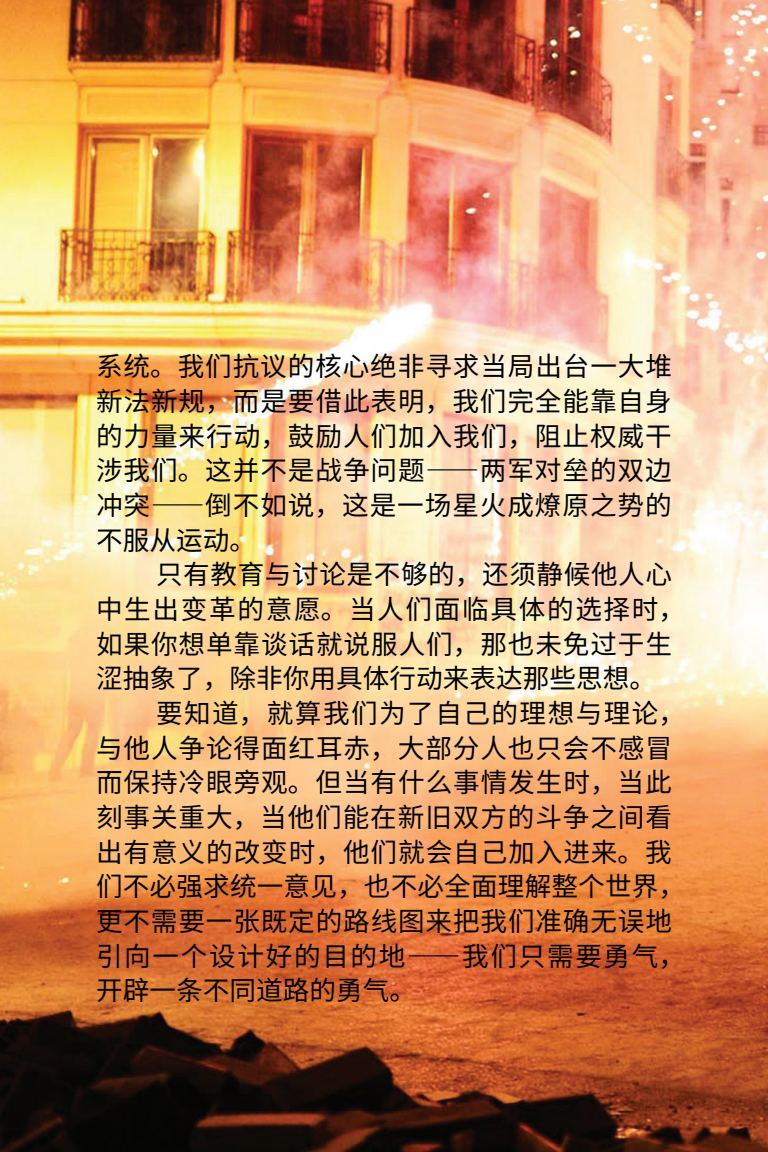
始于 反抗



典型的偏执狂们总是把系统性的问题归罪于一个特定的群体——逐利的资本主义全都由犹太财团支持，经济衰退都怪移民——人们用着和以上例子如出一辙的方式，狠狠地攻击政客们的政治贪腐问题。然而，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实际上问题就是整个系统本身。不论谁来掌权，他们总会稳定发挥，造成同样的权力失衡问题和一大堆破烂事。难道是因为这些系统出了问题、坏掉了，才产生这些问题吗？不，产生上述问题的首要原因恰恰在于——这些毒瘤在一刻不停地、敬业地运作着。

我们本不应与同类为敌，可是那些一成不变的规约与机构却使我们彼此隔阂，甚至于会使我们与自身隔阂。我们内在的冲突要远远多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而在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内心之间造成断层的，正是同一条线。我们的矛头将指向何处呢？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当我们拒绝顺从现行秩序，拒绝乖乖扮演自己被安排的角色时，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撕开那条断层线，邀请天下人都来表达自己的真正立场。

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无治，将头顶的统治者尽皆扫除——既不是换一个在细枝末节上稍微公正一点点的主子；也不是在现存秩序内洗个牌，好重新决定谁来压迫，谁来忍受；更不是通过不伤筋骨的小修小改来纠正，补救这整个旧



系统。我们抗议的核心绝非寻求当局出台一大堆新法新规，而是要借此表明，我们完全能靠自身的力量来行动，鼓励人们加入我们，阻止权威干涉我们。这并不是战争问题——两军对垒的双边冲突——倒不如说，这是一场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不服从运动。

只有教育与讨论是不够的，还须静候他人心中生出变革的意愿。当人们面临具体的选择时，如果你想单靠谈话就说服人们，那也未免过于生涩抽象了，除非你用具体行动来表达那些思想。

要知道，就算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与理论，与他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大部分人也只会不感冒而保持冷眼旁观。但当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当此刻事关重大，当他们能在新旧双方的斗争之间看出有意义的改变时，他们就会自己加入进来。我们不必强求统一意见，也不必全面理解整个世界，更不需要一张既定的路线图来把我们准确无误地引向一个设计好的目的地——我们只需要勇气，开辟一条不同道路的勇气。



问题在于 控制



当你身处受虐之中时，通常会有何标志呢？施虐者也许会试图控制你的行为或是支配你的思想；阻碍或者限制你获得资源；对你使用谎言与暴力，或是将你禁锢在一个不得不依赖他人的境地，并持续不断地监视你。

以上那些是对个人施虐者的描述，但也同样适用于国税局、国安局以及绝大多数统治着我们社会的其他机构。实际上，所有这些机构都以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作为基础——那就是人们都应该被监控、被管理、被统领。

我们身上强加的不公越是加剧，他们就要用越多的控制来维护自身。在权力延续的一面，残暴的控制被用在个人层面上——文字狱、便衣警察、审查制度以及暴力镇压。而在另一面，隐形但又无处不在地，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基本架构之中——从信用评级与保险费额度之间的关系式、通过大数据实行的对隐私的侵犯、通过这些数据来锁定个人并“调查取证”的技术，到社交平台的设计风格。国安局无时不监视着我们的线上活动，并控制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内容。到了现实中，它们权力的大手也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和人权。

当生活的无限可能被削减成一串单调的 0 与 1 的序列时，我们因希求更好的人生而与现有体制发生摩擦的状况就再也不会出现了——这并非因为我们获得了极致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要走哪条轨道，而是在原野上任意驰骋。

问题在于 等级制



我们今天的不平等是由很多种不同的机制造成的。有些依赖于一个中央机构，比如法院系统；其他则的更加非正式——比如社会人脉关系网和性别角色。

这些机制中的一些已经为众人所摒弃。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君权神授，但正是这种在今天看起来不可理喻的机制，主宰了人类数个世纪的历史。还有一些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们好像仍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时代，谁能想象没有私有权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建构——它们真实存在，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是“必要之恶”。官僚和资本家们的存在并不比皇帝的存在更自然、更必要、更有益。

所有这些机制都在共同发展，相互加强。比如，西方种族主义的历史就与其资本主义的历史密不可分——如果不是依靠殖民化、奴隶制和肤色歧视，资本主义就无从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社会的其他等级制度，仅靠个人的偏执，永远不可能促成大兴文字狱的现状。某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论当然可以少量存在，但这不过只是“御用反对派”，反而为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换句话说，只要有警察，你觉得他们会骚扰谁？只要有监狱，你觉得谁会被关进去？只要有贫穷，你认为贫穷的会是谁？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以等级制为基底的社会中实现所谓的“人人平等”。我们当然可以不断地重复洗牌，但只要没有根本上的变革，只要贵贱等级依然存在，就总要有人拿到一手烂牌。

问题在于 **边界**



如果外国军队入侵我们脚下的土地，砍伐树木，污染河流，强迫当地居民宣誓效忠他们，谁不会拿起武器与他们作对？但如果做这些事的是当地政府，同样的一批人却愿意俯首称臣并乖乖交出税金。

边界不仅无法保护我们，而且还会分隔我们，那些被边界排斥在外的人只会对边界内的人充满仇恨；同时，边界内的人也被抽象成了一个并不准确的“共同体”。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也是建立在参政者与无权参政者、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之上的。在古代雅典，这个著名的民主发源地，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了政治进程，并且这些现今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居然拥有奴隶。在美国国内，公民身份仍然能够作为界限强加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并剥夺了数百万非公民掌控他们生活的可能。

自由主义的理想是扩大包容的范围，直到全世界都融入了一个庞大的民主范围中，但可惜的是，不平等已经被写进了社会结构的底层中，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上，数不清的微小边界将我们分成强者与弱者——个人征信、资产、收入阶层……。我们需要一种不基于排斥、不会集中权力与合法性、不会封闭共情的归属。

问题在于 代表



只有行使权力，你才能拥有权力；只有采取行动，你才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如果对世界施加影响的每一次努力都必须通过代表们的斡旋，或者转化为机构的规章制度，我们就会疏远彼此，忽略自身的潜力。在那之后，每一个我们曾屈服的机构和规章都会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变得面目全非、充满敌意，并将我们逐个击破。那些总是让我们失望的政客，只能说明我们已经放弃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警察的暴行是我们因不想为自己负责而亲自种下的恶果。

在信息时代，为了管理好我们的公众形象，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秘书。我们的名誉已经成为外在的东西，就像吸血鬼一样，吸食着我们。我们在各种方面越来越“内卷”，这正是因为我们彼此疏远、在人才市场的“社会熔炉”之中竞相推销自己。若非如此，我们还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些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制作的金塑像上吗？

我们是不能被简化的。无论是代表还是抽象，都不能代替我们。将人类简化为人口统计，将天然的经验简化为数据，我们就会忽视世界上珍贵而独特的一切。我们需要存在感、具体性、彼此间的直接接触和对生活的直接控制——这些都是任何代表都无法给予我们的。

问题在于 领导



领导结构是一种社会失调。在这种失调中，群体中的大多数参与者都不能发挥他们的自发性或批判性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还将自发性视为特定个体独有的，而非人人共有的品质，我们就将永远依赖于领导者，任其摆布。其实“模范领导”与“腐败分子”一样危险，因为他们所有值得称赞的品质只会抬高他们的地位和强化他人的敬畏，这会使得众人更加无法独立行动。

当警察到达抗议现场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谁是带头的？”，这并不是因为领导对于集体行动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领导是行动的软肋。当殖民者们来到所谓的新大陆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只要有了答案，他们就省去了几个世纪的演变与征服。只要有一个领袖，他就可以被架空、撺掇或扣为人质。只是成为弱点还不算什么，最坏的情况下，领导权甚至能在反抗者内部复制他们所反抗的当局的财权结构。看看历史上的反抗运动吧，有多少是因为领导权的争夺而不攻自破的？只有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自发性，都有意识的管理自己，才能构成健康的人际网络。

问题在于 政府



政府许诺权利，却只能剥夺自由。政府对权利的定义意味着要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赋予和保护这些权利。然而，只要国家有足够的力量保障权利，就有足够的力量剥夺权利。授权政府解决一个问题只会为政府制造更多问题来敞开其扩张权力的大门。而且，政府不会凭空产生权力——他们手握的是我们的力量，而我们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它，毋须使用繁杂的程序和制度。

民主与专制在其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即将权力和合法性集中到垄断武力的机构上。无论是听命于皇帝、国家主席还是总统，还是为人民服务或对选民负责，都无关紧要。法律、官僚机构和警察的历史比民主更悠久，它们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可以投票决定由谁来管理它们，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把它们视为“为我们服务”的——尽管它们实际上还是被用来对付我们的。

独裁统治其实并不如一般描述的稳定——不管你屠杀、洗脑和囚禁多少几代人，他们的后代总有一日会为自由而战。民主制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非一些人的暴政，而是多数人的暴政。它用“民意”的幌子将自己伪装成了尊重自由和不同意见的形象，但实质上仍然存在强迫人们接受的标准和叙事。人们越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就越受欢迎。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恰恰造成了

惊心动魄的资源和权利分配不平等：除了民主制，再没有什么制度能让人深陷泥潭时还能如此心安理得了。

当权力集中时，人们必须脚踩着其他人，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争取自治的斗争就会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看看殖民国家的内战吧，这些内战正是发生在曾经称兄道弟的人们之间的。掌握权力的人只能通过对本国人民或外国人民发动长期战争来保住权力——前者武力控制了局面，后者则创造了共同的假想敌来稳住局面。

等级制越是盛行，权力就越容易集中。给这些制度打补丁，只不过是希望我们身上的寄生虫保护我们罢了。对当局施加影响而不被卷入他们的游戏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能够自主行动的横向网络。当我们足够强大足以迫使当局认真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在没有当局的情况下解决我们的问题。

只有通过自由，才能获得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所有机构的集中，而是广泛的互动渠道；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统治合法性，而是多重叙事的空间。取缔政府固有的强制手段之后，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促进自治的决策结构，以及能够让潜在统治者望而却步的自卫实践。



问题在于 **盈利**



货币是实现不平等的理想机制。它是抽象的：似乎一切都可以用它度量。它是普遍的：几乎所有意识形态的人都承认它，它甚至在现代经济学中被当作一种默认条件。它是非个人的：跟世袭的特权不一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它是流动的：很容易通过它来实现“阶级跃迁”。等级制中的等级越不固化，为它辩护者就越容易将被压迫者的苦难归咎于“不努力”，从而使这种制度的毒害越来越根深蒂固。许多人，不愿意被独裁者所统治，却甘愿跪倒在市场权威面前。

当所有的价值都被一个抽象的工具所主宰，我们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瞬间都失去了意义，成为抽象的权力计算中的代币。一切无法在经济上量化的东西都成了累赘。生活变成了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我们变得各自为战、弱肉强食。

牟取利益意味着相对于其他人而言，获得对社会资源更多的控制权。在私有制的天平下，我们不可能共赢，一个人获利，其他人就必然会失去些什么。如果老板想要从员工劳动中获利，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他给员工的报酬必然比员工所付出的劳动“应得”的要少，正是员工白白劳动的这部分流进了老板的口袋，变成了他的利润。

以利润为驱动力的体系在集中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贫困。竞争的压力使得技术的创新比以往都快，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这种驱动力下变得越来越大，直到让人不忍直视：富人的生活越来越奢华，穷人却逐渐无法糊口，只能以乞讨或偷盗为生。由于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对社会整体的益处，人类的生产最终都会造成或社会或自然的灾难。全球变暖只不过是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先行部队罢了。如果制度的根本不动摇，再强大的资本家也无法阻止这些灾难的到来。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根本不鼓励资本家解决这些危机，它们反而更可能趁着这个机会再捞一把。

问题在于 财产权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产权——又一种我们从王公贵族的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建构。虽然现如今财产的转手越来越快，但其基本概念仍然不变，即利用暴力来人为造成土地和资源上的不平等。

有些人认为财产权可以独立于国家机器单独存在。但若没有一个中央集权机构将财产的概念强加在我们身上，财产权就毫无意义。更何况，只要中央集权的机构存在，就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毕竟连财产权本身也是由它们所定义的。你赚的钱是国家铸造的，要交税，还受通货膨胀率影响。你的车属于交管局，它们只是允许你上路行驶。你的房子是从国家手里租来的。即使有朝一日你拥有了这些，一纸征用状也可以随意发配你的全部家当。

怎样才能守护重要的东西？其实，政府只有靠从我们这里掠夺才得以生存，它们拿走的永远比它们给予的要多。市场只会奖励最会掠夺同胞的人。真正保险的只有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需要足以自卫的互助网络。

当金钱和财产权被消灭后，我们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将由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决定。在这个时代，则完全相反——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全都听命于肤浅的物质关系，所有人之间的交往被物化为了“利用价值”，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关系，也就变的无用了。消灭财产权并不意味着你会失去你赖以生存的东西，而是意味着任何市场的崩盘或者警察都无法将它们从你手中夺走。与其讨



好官僚机构，我们不如从人类的需要出发；与其互相欺骗和利用，我们不如互相依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寄生虫们最害怕的就是一个没有财产权的社会——他们不能再仗着权势作威作福了，人们会更加看重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而非他们手握多少财富。没有了财产权，每一份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也就没有了进行无用或者破坏行为的意义。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热情、友爱、慷慨——都不再是透支物质才能享受的稀缺品了，这些东西的稀缺性，本就需要大批的安保和财产分析师来保持，而只要它们仍然稀缺，我们就会在互相的无意义竞争上越走越远。



最后的反叛



每一种秩序都基于对前一种秩序的反叛——正是这反叛使得前一种秩序解体了。在那之后，由于人们开始将新的秩序习以为常，新秩序就获得了它的合法性。美国的建立正是始于对英国国王权威的反叛。如果我们有生之年能见到的话，新社会的建立也会始于对我们今天的法律和机构的全面反叛。

所有超出当前社会允许范围的行为都被归为犯罪，或者说，反叛——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意义上来说。每一种制度都被其无法同化或控制的一切所困扰，每一种秩序都包含了破坏其自身的种子。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曾经帝国与今日的文明，但取代这些的会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想象一种秩序，不需要将人们分为公民与罪犯，不需要将行为分为合法与犯罪，不需要在地位上将人们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后的反叛将创造何种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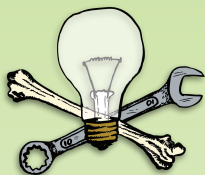
安那其状态，或者我们叫它无政府状态，就是秩序不由暴力强制维持的状态，是最纯粹的自由——它是有机地、不断地重塑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自己的过程。

一切自由发生的过程或现象——热带雨林、好友的圈子、你自己的身体——都是通过不断地变化而得以存续的，安那其式的和谐。另一方面，任何自上而下的控制都只能通过约束与胁迫来维持——高中自习室的脆弱秩序、工业化农场不稳定的规章、超级大国易碎的霸权，都是如此。

安那其主义是相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决，任何法律、政府或规章都不如满足人类的实际需求重要，认为人们应该自由地构建彼此满意的关系，并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学说。

安那其主义不是一种教条，也不是宏大的蓝图。它不是像民主制度那样需要特定机构才能运行的系统，也不是像共产主义的“人民的政府”那样大而空的东西。它是一种我们现在就可以付诸实践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对于任何的价值体系或行动方针，我们应当先问自己一句：“它是如何分配权利的？”。

安那其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将权利集中的货币、分隔我们与自身潜力的体制。我们反对封闭的系统，我们拥抱眼前的未知，并乐于探寻它们。我们同样尊重我们的不确定性，因为只有把握住了不确定性，我们才拥有了自由。



这本小册子由CrimethInc.编写，
它是一个由有志之士组成的国际网络。

您可以在crimethinc.com找到他们的其它作品
——包括书籍、电影、播客和各种新闻报道。

来自五大洲的同志合作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志愿者们为印刷费用提供了支持。



中文版由万民书社翻译，
万民书社是一个中文安那其主义书籍的网络出版社。

您可以在wanmin-books.github.io
找到更多万民书社整编或翻译的书籍。

当我们尝试总结所有统治机构和体制的共同点时，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每个人各自的反抗和斗争都是某种高于我们的东西的一部分，它连接了我们所有人。

当我们通过这种联系走到一起时，一切都会改变——不仅是我们的斗争，还有我们的能动性、我们喜悦的能力，以及我们生命的意义。只要我们能够基于与今日不同的逻辑行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彼此。

**改变以前，
任何点滴
都是起点。**

**不要固守
旧的世界**



crimethinc.com